

□赵畅

范纯仁“著作林”里的另辟蹊径

北宋年间,范纯仁起初担任著作佐郎。后来,他以这个身份到襄城县担任了知县。经实地考察,他发现当地气候、水质和土壤非常适合种植桑树。于是,他号召大家种桑养蚕。可老百姓对种植桑树不感兴趣。于是,他发布了一项命令:“有罪而情轻者,视所植多寡除其罚。”犯人喜出望外,纷纷开始种桑养蚕,而且见效很快,获利不小。为此,老百姓们也坐不住了,都加入了种桑养蚕的行列,并因此致富。为了纪念范纯仁,当地百姓将那片桑树林命名为“著作林”。

老百姓将桑树林命名为“著作林”,与其说是对范纯仁的纪念和追思,倒不如说是对范纯仁留下富民政绩的肯定和褒奖。“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”,“著作林”正是范纯仁赢得的百姓好口碑。

想当年,“著作林”渐渐成为致富一方的支柱产业,以至今日成为令襄城百姓骄傲的“网红打卡地”,也并非一蹴而

就。范纯仁当初号召百姓种桑养蚕,初衷是增加当地百姓的收入,他想当然以为百姓肯定会拥护,但百姓因看不到实际效果不肯种,这让范纯仁很被动,幸好他及时转换思路,使出“让犯罪情节较轻的犯人,可以看他所种植桑树的多少而换取减刑的机会”这一“高招”“妙招”,使得这道难题终于迎来了破题的曙光。尔后,经了“见效很快,获利不小”这一“杠杆”的撬动,终令老百姓闻风而动,并有效实现了“整个襄城县桑树成荫,家家养蚕,老百姓走上了富裕之路”这样的预期。

时至今日,再读范纯仁的“著作林”故事,依然让人受益匪浅。其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三方面的启迪:一是“为官一任,造福一方”,当为领导干部的职责所在,必须恪尽职守、倾情奉献;二是为百姓办实事、做好事,不能光喊口号,要加强换位思考,用事实说话,让眼见为实;三是破解难题和矛盾,要拓宽思路、创新办法,发挥好树点榜样应

有的引领作用。

既为官,就必须为老百姓谋利益谋福祉。“当官不为民做主,不如回家卖红薯。”“为民做主”最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让老百姓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、越来越满意。否则,就是懒政不作为、渎职不称职的表现。作为范仲淹的儿子,范纯仁自没有淡忘其父“先天下之忧而忧、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苦乐观。他走马上任来到这个属于贫困地区的襄城,就将如何让老百姓脱贫致富这个重要课题放在了心上。于是,经过实地调研考察,“发现当地气候、水质和土壤非常适合种植桑树”,便成为他的实地调研成果;“号召大家种桑养蚕”,则是他必然的决策结果;而持续推动科学决策的落小落细落实,更是“著作林”成为富民林最直观最形象的见证。

为官者,理当自觉坚持权为民用、情为民系、利为民谋,但这并不意味着,为老百姓办事,我们可以放开手脚去干一厢情愿的事情,可以靠简单的行政命令

和强迫手段去推动方方面面的工作。事实上,这样做尽管主观愿望和出发点是好的,但有时效果或许适得其反——由此极易引发生逆反心态,致使好事办成坏事。因此,我们须加强换位思考,多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,去谋划决策。毕竟,事关切身利益,老百姓更愿意在看到事实真相后才认同并配合行动。事实上,只有让他们真真切切看到收获满满的结果以后,才能让他们下定决心。

为老百姓解决烦心事、操心事、揪心事,有时还须更新理念、另辟蹊径,敢于担当、善于化解,用新眼光观察问题,从新角度提出问题,用新思路分析问题,用新办法解决问题,真正把实事办好,把好事办实。作为封建时代的一名官员,范纯仁能够出此招数,其情可表、其勇可嘉、其智可鉴,值得今天的官员们好好学习。

读书人和屠狗辈

“仗义每多屠狗辈,负心多是读书人。”这句话出自明末文学家曹雪芹笔下。流传至今,依然广为人知。

关于这句话的由来,有两个版本的传说。一是当年曹雪芹罢官回乡,去一位屠户家串门,见其客厅挂着一副对联:仗义半从屠狗辈,负心多是读书人。深以为然,抄录下来,融入了自己创作的新诗。于是有了《至屠夫徐五家见悬此联》:“蝇营狗苟贪妄欲,人猿如何再作揖。仗义半从屠狗辈,负心多是读书人。”后人传播过程中,略作修改,形成了如今这个名句。

另一个版本是天启二年,曹雪芹被起用为广西右参议。某日接到一个案子:当地一户皇亲的家奴,在街上纵狗

咬人,被咬者是一位秀才,眼见就要被恶犬咬死。路旁肉铺一个屠夫冲上前,杀死了恶犬。家奴将见义勇为的屠夫绑赴官府,曹雪芹正好审理此案,不仅当庭判屠夫无罪,还判家奴赔付秀才医药费。岂料皇亲知道了,私下给秀才施压,威逼利诱,再审时秀才翻供,诬陷屠夫。曹雪芹大怒,对秀才大刑伺候,屠夫这才没有好心遭恶报。事后,曹雪芹愤然在案卷上写下:“仗义每多屠狗辈,负心多是读书人。”

古时社会等级森严,何以曹雪芹会褒扬低贱的屠狗辈,贬低体面的读书人?或许与他出身有关,曹雪芹的父亲卖饼为生,母亲早逝,家庭贫寒。原生家庭社会地位与屠狗辈无异,经济上可

能还不如屠户。后来他中了进士当了官,成了文人阶层的一份子。由于为官清正,他仕途并不顺利,几起几落。虽然每到一地,政绩都很出色,却屡遭诬陷,应该吃了读书人的不少苦头,所以他说出这样的名句并不奇怪。

也有人批评曹雪芹以偏概全,他自己的一生就打脸了这个名句。崇祯十七年,崇祯帝在煤山自缢。曹雪芹听说后投池自杀,被人救起。后来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组建小朝廷,改元隆武。危难时刻,曹雪芹挑起了重任,第一次成为朝中重臣。然而清军很快攻陷福州,曹雪芹在家自缢殉国,并留下绝命联:“生前单管笔,死后一条绳。”

从绝命联看,曹雪芹显然自认为读

书人。而他对国家对百姓的“仗义”,岂是一般屠狗辈可比? 历史上名垂千古的人物之中,读书人也远比屠狗辈多。那么是曹雪芹说错了吗? 当然不是!如今干部之中有句常用语“不能将自己混同于一般群众”。古代读书人掌握着大部分公权力,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,自然也就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。屠狗辈中有一小部分不畏强权,敢于见义勇为,足以让人刮目相看。而读书人中,如果相当部分一心只谋私利,社会就会变得非常黑暗。

曹雪芹的名言是给读书人敲响警钟,用“屠狗辈”刺激他们洁身自好,知耻后勇,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。

□倪梦洁

闲坐小窗读书时

家中的书房有一方小窗,窗外是家中的院落,栽种着一颗玉兰树、一颗桃树,还有几盆花花草草。春风绕过墙头吹进院落中,窗外的景色犹如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,被框在这一方木窗之中,烂漫至极。

闲坐在小窗前,伴着柔风,提壶泡上一杯清茶,再翻看一本喜爱的书,瞬间觉得岁月静好,任何喧嚣都被阻挡在这一窗之外。

我总会和朋友说起,书是最会挑地方的。记得有一次在高铁站,来来往往的脚步声和人潮的喧闹声在车站里不断翻涌,来到这里的人好像都带着一颗焦灼的心,时间像是会在这里被加速,每个人都在急着赶路,急着回家。但我回头间,却看到一个女生在车站的移动书店买了一本汪曾祺的《慢煮生活》,坐在角落慢慢品读。她也会时不时望望

□王厚明

寒山寺“夜半钟声”的回响

暮春四月,来到苏州干部学院易地学习,由于住地离知名的寒山寺不远,傍晚散步就想着去看看寒山寺的夜景。乘着夜色,信步枫桥,寂静的寒山寺游客不多,只见铁岭关的城墙上切换映照着一“月落乌啼霜满天,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,夜半钟声到客船”的字幕,似乎感受到当年张继身逢乱世、羁旅他乡的失落境遇。不由地想,如今寺在人非,如果寒山寺能定时敲响一下钟声,兴许会更能增添历史的韵味,勾起今人的遥远记忆。

敲钟,是佛门寺院报时警世的讯号,“晓击则破长夜,惊睡眠;暮击则觉昏衢,疏冥昧”。静夜听之,声张庄严,宏伟悠扬,有令人振聋发聩、澄思涤虑的感觉。继张继之后,宋代米南宫也有诗证实这醒悟人心的百八杵,早就成为寒山寺的奇观了:“龟山高耸接云楼,撞月钟声吼铁牛。一百八声俱响彻,夜行犹自不知休。”

只是,张继《枫桥夜泊》这首千古流传的绝唱,还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“公案”。缘由是宋代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曾在《六一诗话》中提出质疑:“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,亦语病也。如……唐人有云:‘姑苏台下寒山寺,半夜钟声到客船。’说者亦云句则佳矣,其如

角落的窗外,但也只是淡淡地看了一下,又看看手腕上的表,随后又继续低头看书。

这让我想到了这本书中的一个桥段:汪曾祺先生曾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参加劳动,和三十几个工人同住一个屋檐,可任凭他们吵吵闹闹,即使窗外的世界在打着马锣,唱着山西梆子,汪曾祺先生都能做到心如止水,一如既往在这样的环境下看书、写文章。

但是此刻,我这边窗外的景色却大不相同。鸟声鸣啾,春光灿烂,一派春日的祥和景象,正是因为如此,我却对李娟的那本《冬牧场》有了兴趣,低头翻开书,便是另一个世界。

李娟的笔下,牧羊人一生披星戴月,风吹雨淋,穿梭于大地上,在山与山之间来回奔波。在牧羊人的世界里,一

台信号不好的电视机就能痴痴看上大半天,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就能欢快一整天,一次短暂的聚会就是一场友谊的深化。通过这本书,我能深切感受到窗外的另一个世界,抬头间才发现自己此刻能闲坐在这里看书喝茶,是一件多么多么幸福的事。

我是喜欢闲坐在窗前读书的,伴着悠悠的风,一方静谧,独自思考,抬头间看着窗外的世界,想着书又何尝不是一方窗口,窗里窗外是不同的世界,而书里书外亦有不同的情愫。

空闲之余,就闲坐在窗前读书吧,将一本书变成一个窗口,感受天南地北不同的人生阅历和风景,或许我们心中的那片天地也会变得更加宽广。

所谓夜半钟者,景阳三更钟耶?今之定夜钟邪?然于义皆无害,文忠偶不考耳。”他考证认为吴中地区的寺院,确有夜半鸣钟的习俗,谓之“定夜钟”。而宋阮景山担任吴兴太守时,曾经禁止夜半敲钟,可见夜半钟声由来已久。

“知者非真知也,力行而后知之真”。古人因一句“夜半钟声”而历经几个朝代八百年的接续考证,或追根溯源,或实地访查,或多方核实,值得今人学习参考。欧阳修未经调查研究而轻言夜半无钟声,自然有违今日的“没有调查,没有发言权”,也赋予人们求真务实的朴素意义。正如毛泽东在《反对本本主义》中所指出的:“迈开你的两脚,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,学个孔夫子的‘每事问’。只有说话办事去除了主观臆断,自以为是的,凡事莫想当然,不停留于表面,不拘泥于本本、不偏执于主观,做到了亲知广知深知,才能获得符合客观规律的真知。”

如今,苏州也有个“寒山闻钟”的网络论坛,市民访问发帖,相关部门关注、处理并回帖,已经成为政府部门畅通诉求表达、践行网上群众路线、察民情、知民意、解民忧的重要平台,可谓是求真务实、探索寒山寺“夜半钟声”真假的时代回响。



树网
王成摄

□陈思娟

“争”改“让”

尚可喜清代藩王。顺治六年,身经百战的尚可喜凭借为建立和巩固清王朝立下的汗马功劳,获封“平南王”。皇上赐金印金册。而皇太后还特别恩赐一件熏貂领花绸锦袍。何意?因尚可喜的优秀离不开母亲的养育和教诲呀!殊不知,这下可难为了尚可喜,因他有两位母亲,一个生母,一个养母。这件锦袍给谁呢?一件好事,却成了烫手山芋。

果然,两位母亲听到风声都找上门来。生母说:“我亲生的儿子,这锦袍得归我。”养母说:“我养大的儿子,这锦袍不归我归谁?”谁也不甘示弱,吵得不可开交。尚可喜左右为难,思来想去,既然一件锦袍不好分,还不如退回去,谁也别得。于是据实上奏,说自己有两位母亲,生母、养母对皇太后恩赐的锦袍争执不下,都想要,又不好给谁,只好送还。这时有幕僚看了,认为两位母亲为一件锦袍争执不下,说出去有损颜面,于是将“争执不下”改为“礼让不迭”。尚可喜认为这样改也好,便依改动的奏章报了上去。皇太后看过奏章后,叹曰:“两位母亲如此贤德,难怪尚可喜能出人头地。”随之又赐了一件同样的锦袍。

“争”改“让”,这一改解决了尚可喜的难题,两个母亲皆大欢喜。这份奏章之改道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:人生之路难免遇到很多“争”的难题不好解决,如果改成了“让”,问题可能会迎刃而解。历史上桐城“六尺巷的故事”便是妇孺皆知的由“争”改“让”的典型范例,无需赘述。1955年,我军第一次评定军衔时,当时作为具体负责全军评衔工作的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带头“让衔”,按照中央军委规定的条件,他以前担任过兵团政委,正兵团级,又现任总干部部副部长,是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条件的。当他看到授予上将军衔人员名单中有他时,他即向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写信,要求不要授予他上将军衔。当上面研究后没有同意时,他又给毛主席写信,请求不要上将军衔,还以自己主管干部授衔工作和便于向干部做工作为理由,要求低授。最后军委接受了他的请求,授予他中将军衔。他是全军唯一一名正兵团级干部未授予上将军衔的人。他这种“让衔”的高尚情操,在军队中影响很大,传为佳话,引为楷模,让一些“争衔”的干部脸红,全军授衔工作得以顺利开展。

其实,尚可喜两位母亲“争”的不在